

 博瑞森
BPACE
人文丛书

张再林
哲学作品集

治 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张再林◎著

Zhang zai lin
Philosophy Works

THE THEORIES OF
GOVERNANCE:
THOUGHTS ON
MANAGEMENT
IN ANCIENT CHINA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张再林
哲学作品集

治 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张再林◎著

Zhang zai lin
Philosophy Works

THE THEORIES OF
GOVERNANCE:
THOUGHTS ON
MANAGEMENT
IN ANCIENT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张再林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 8

ISBN 978-7-5402-4605-1

I. ①治… II. ①张… III. ①管理学 - 思想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C9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5899 号

书 名：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作 者：张再林

责任编辑：满 懿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100054

网 址：<http://www.bjyspress.com>

电 话：编辑部 (010) 65240430

电子信箱：bjyspress@126.com

印 刷：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145 毫米 × 210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25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1) 坚持现象与实在的二分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和一贯传统，其经验主义与超验主义是结伴而行、互为补充的。

(2)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家并不把现象与实在加以区分，而是以“本质直观”的方式把现象与实在视为显微无间的整体。这种寓实在于现象之中的整体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道”。

(3) “下学上达”的彻底经验主义已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理学”对这一传统的歪曲和背离。

(4) 从“显微无间”到“道德合一”。作为人的合目的性（“得”）的“德”。

(5) 中国古代“主体即本体”的思想。“此在”的“我”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人本主义”。

(6) 在中国哲学里，“超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的“不即不离”关系。故中国哲学是一种“内在的超验”而非“外在的超验”的学说。

(7) 中国哲学把“本体”不是视为某种“实有”，而是看作为一种“即用显体”的功能性的过程，也即古人所谓的“主宰即流行”。这就导致了以“生生”为其宗旨的中国古人特有的“易”论。

(8) 宇宙的“生生”过程不是来自某种外力，而是生命自身的阖与辟、阴与阳、静与动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生命被视为“自我运动”。

(9) 从天道的“生生”推之到人道的“健行”。中国古代的易论最终落实到人的行为。

第二部分 礼治理论

(1) 行为的“履”也即中国古人所谓的“礼”。作为集中国早期社会礼之大成的“周礼”，以及“周礼”的核心内容。

(2) 周礼的式微及孔子的“复礼”活动。

(3) 《荀子》的礼的理论及《礼记》的礼的思想。礼的“合题”在汉的出现。

(4) 以“祭”为突破口的对礼的形式本身的考查。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礼并非一种纯粹的“仪”，而是寓“义”于

“仪”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这种形式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二者实现了其有机的统一。

(5) 礼不仅是人的个体行为的普遍形式，亦是人的社会活动的普遍形式。礼使中国古人的政治方式不再是一种异己于人的东西，而成为既有一定外在的社会规定又与个人的内在的情感表达密切相连的审美形式。为孔子的“正名”说“正名”。

(6) 故中国的“礼治”思想最终是通向“人文主义”的。作为人的“自由形式”的“文”的哲学考查。“人文主义”在现时代的重要的意义。

(7) “文明”源于“情深”。从外作之“礼”的考查深入到中出之“乐”的考查，礼之文的形式最终还原为乐的“情感逻辑”。

(8) “礼治”之于“法治”的优越。礼治最终走向人的“行为自律”。

(9) 对礼的“本质还原”使孔子从“礼”走向“仁”。

第三部分 仁治理论

(1) “仁从千心”。儒家从礼之“亲亲”中挖掘出更具普遍性的人之“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作为人之通性而成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本。

(2) 在中国儒家“仁”的学说里，这种“恻隐之心”作为人之端绪被视为是一种人之“潜能”，故人的伦理行为的实现并非“我”之让渡而是一种自我的生成。

(3) 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的逻辑，决定了这种生成

论的“仁”和宇宙中生生不已的“道”是完全同一的。仁既是人之“伦理”又是宇宙之“本体”地被赋予了绝对的意义。

(4) 中国古人的政治不过是中国古人的伦理的放大形式。政治被视为我之“恻隐之心”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的“移情”过程。这就导致了充满博爱精神的儒家的“王道”理想的应运而生。

(5) 把仁的原则落实为人的具体行为就是所谓的“义”。与“利”相比，“义”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

(6) 仁的“内在超验”的性质表明仁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故仁学并没有流于“唯爱”“唯义”的形而上的独断，而是“从容中道”地与“权”的原则有关的。

(7) 仁作为人的本己的、固有的属性，决定了仁的实现并非“外索”而是“内返”。“反求诸己”成为“为仁之方”的关键。

(8) 能否“返求”取决于人能否克服物欲对自己人性的遮蔽。儒家“克己复礼”学说的提出，以及由此出发形成的中国古人的“修身”传统。

(9) “修身”落实到“明教”。对人性的“教化”不啻为儒家治论的最终结论。

第四部分 法家论

(1) 法家学说之所以作为儒家学说之“反题”，溯其理论渊源，实出自其一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传统的所谓“明于天人之分”这一哲学命题。

(2) 突出“天”与“人”的各自有别，必然重视认识上的“征知”。法家的注重“辨合”“符验”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路线。

(3) 宇宙中的天人二分的思想反映在人学领域，就导致了“性恶”“为善”这一人之“性”“伪”之二分。法家的强调“法正”作用的法治理论因此而产生。

(4) “性恶论”使法家视人为趋利避害的动物，故法家不惟不反对人的“利取”原则，反而主张用人之自利之心以实现天下之治道。

(5) 功利主义使法家鄙薄“仁义”。其从实证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先王的“王道”而积极鼓动吹后王的“霸道”。

(6) 法家的“法”的理论包括“法”“术”“势”三个方面。“法”“术”作为君主之“制”，“势”作为君主之“资”，二者互为发明、互为服务。法家“抱法处势”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开中国专制主义治论的造始端倪。

(7) 法家学说的得与失。法家理论的失误在于其以“法”释“道”而把法本体化、绝对化的倾向。这种体、用之颠倒，是对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治之传统的历史反动。

第五部分 墨家论

(1) 墨家的“三表说”的提出，使墨学具有极为鲜明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征。

(2) 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出发，墨学与主张“性”

“命”合一的儒学不同，坚持“力”能胜“命”的“非命”。

(3) 经验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其经验的“非命”论的提出又是以超验的“天志”说为其必然补充的。

(4) 与那种作为“士”的思想代表的、具有超阶级倾向的儒学不同，墨家的社会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代表了下层被奴役阶级的呼声。

(5) “兼爱”说在墨家的社会学说中具有中枢地位。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存有本质区别：由于无视“亲亲”作为爱之基础，使墨家的爱的学说远离人性。

(6) “兼爱”的非人称性使墨家求助于政治上人为的“尚同”，使其与法家学说互为补充地共同服务于专制主义的理论的论证。

(7) 由于反对“爱有差行”的“兼爱”说和反对“和而不同”的“尚同”论的提出，墨家最终走向对古代“礼治”传统的否定，即走向对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反动。其“非乐”说的提出就是明证。

(8) 墨学的衰亡源自其学说的非人称性这一理论的先天不足。墨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

余 论

(1) 从“行为科学”到“科技治国论”，西方见用忘体的管理学的深刻危机。儒家“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2) 对韦伯的对儒学的批判的批判。儒学化的日本管理经验对世人的启示。

管理学，作为一门有关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及其组织系统的学说，不啻为人类最古老的学说而实际与人类社会历史是同步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学说的重要意义直到近现代才为人们所认可所关注。同时，人们不仅把这一学说主要限于工业生产领域，而且因之而仅把其视为长于制作技术的西方人的专利。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谈到这种为西方人所发明的并为今人所普遍恪守的管理学说的主要观点时指出：

(1) 管理人员要负责为了经济目的而把生产性企业的各项要素——金钱、物资、设备、人员——组织起来。

(2) 就人员来讲，这是一个指挥他们的工作、激励他们、控制他们的活动、矫正他们的行为，使之适合于组织需要的

过程。

(3) 如果管理人员不这样积极地干预,人们会对组织需要采取消极的——甚至对抗的态度。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说服、奖励、惩罚、控制——必须指挥他们的活动。这就是管理人员的任务。我们常常把它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来把事做成。

而这种所谓的管理人员的“积极地干预”的方式,尽管其花样可以不断地翻新,但实际上总不出乎“胡萝卜加大棒”这一“恩威并施”:

在一个极端,管理人员可能是“严厉”或“强硬”的。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包括强迫和威胁(常常伪装起来),严密监督,对行为紧密控制。在另一极端,管理人员可能是“温和”或“软弱”的。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包括宽容,满足人们的要求,求得相安无事。那样,人们就会易于控制,接受领导。……

目前的流行主题是“坚定而公正”。这是一种兼采软硬两种态度之长的企图。它使人想起老罗斯福的“言语温和,但手中拿着一根大棒”。

同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种不言而喻的对“人”的假定:

- (1) 正常人生性懒惰——尽可能地少做工作。
- (2) 他缺乏雄心壮志,不愿承担责任,宁愿被人领导。
- (3) 他天生就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

(4) 他的本性就反对变革。

(5) 他不太伶俐，易于受骗，易于受到骗子和野心家的蒙蔽。

这就是所谓的“群氓假定”，即假定“人类是一群为个人利益所驱动的无组织个体”。但是我们不能不问，这果真是对人类本质最真的写实吗？镜子里的我自己果真是如此的丑陋吗？如果是，那么现行的管理思想及方式就成为并且永将成为不可易移的铁律，如果不是，那么这种管理思想及方式作为一种无据之偏见，而决定了其在人类历史上尽管被奉若神明但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我们看到，伴随着现代人类自我反思精神的日益深入，这种现行管理思想所赖以的人学前提在理论上正遭致人们愈来愈多的质疑和非议。例如西方“人类动机学说”的创始人马斯洛令人信服地提出，人不仅受自己的动物化的“生理需要”所驱使，而且亦以“自我实现”这一“类”的需要为动力。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不无雄辩地指出，人不仅是一种受制于种种物的规定的既定的存在，而且亦是一种超越规定的、自己完善自己的“潜能”。同时，这种对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能力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人的社会本质即“主体间性”的再认识。人们开始发现，社会已不再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人”的简单相加，即一种纯粹出于某种外在目的而人为结合起来的“利益共同体”，而是作为自我本身的一种表现和延伸形式，它本身就具有一种自组的“原始的亲合力。”这样，诸如“爱”“同情”“伦理”这些业已被人遗弃的传统概念

将不再被歧视为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呓语”，而是再一次登堂入室地进入到人类社会学说的腹地，成为人类社会行为及组织的坚实构架和基石。而这一切，无疑为一种新的管理学说提供了理论前提。

正如为今天初露头角的现代西方“Y理论”等管理理论所表明的那样，这是有别于传统的“物本”的一种“人本”的新的管理学说。它坚持：在管理活动中，人不再是与其他物的因素同等并列的一种“要素”，而是作为“主体”始终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管理不再是唯利是图地片面追求所谓的“效率”，而是最终以人的内在目的，即自身价值实现为宗旨；有效的管理不再是完全求助于“胡萝卜加大棒”这一利与力的交用，而是基于人自身的自觉和自治。最后的结论是，人类的管理不再是人的一种纯粹的“手段”，而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耐人寻思的是，当如梦初醒的西方人在这种人本主义的管理学说里认为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管理的新世纪的时候，而对于东方的中国人来说，它却早已成为过去了的辉煌的历史。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古代“治”的理论这一本书的主题。正如本书将要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儒家的社会管理学说，即其以“礼”和“仁”为核心的“治”的理论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极为自觉、极为成熟的人本主义的管理理论。随着本书的展开，读者将会看到，这一理论如何以一种彻底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哲学作为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如何不留斧痕地克服似乎无法调解的存在于人类社会行为与社会组织中的种

种两难和对立，这一理论如何在与其他学说（法家学说与墨家学说）的对比中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最后，读者将随着作者从过去走向今天，去领略这一理论为我们所展示的现代意义。

我们希望，这种对人类管理学的“考古”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一种新的人本主义的管理学的理解，而且也将重振昔日管理学在人类社会地位的显赫。在人类古代，正如中国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管理学作为一种普遍的“治道”，作为一门一以贯之的安邦济民的“经世之学”，曾被视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的宏伟事业。但是在今天，它作为一种日趋支离的部门之学而日渐沦为目光短浅的技术官僚的纤术细学。然而我们相信，随着管理中的人本学意义的发现，同时也随着管理学最终成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功能”而不是对其局部的“质”或“量”的把握的学科，它将从一种为经营学服务的辅助性学科一跃成为一种具有领导性和统摄性的学科，而再次登上“元社会学”的宝座。

而这不正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真正地自觉支配自己的时代的到来吗？

内容提要

引 言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第一章 彻底经验主义

一、西方哲学的超验主义倾向 004

二、“道”的非超验性质 007

三、作为中国传统的彻底经验主义 012

第二章 人本主义

一、从“道”到“德” 018

二、“我”的发现 021

三、“内在的超验” 026

第三章 唯生主义

- 一、“生生之谓易” 032
- 二、“阖辟成变” 038
- 三、“知行合一” 042

第二部分 礼治理论

第一章 礼的历史考查

- 一、周初礼的变革 050
- 二、孔子之于礼 056
- 三、礼的历史命运 062

第二章 “有意味的形式”

- 一、“祭”的本质 070
- 二、“正名”的思想 078
- 三、“人文主义” 086

第三章 “情深而文明”

- 一、“礼”与“乐” 094
- 二、“礼治”与“法治” 102
- 三、从“礼”到“仁” 109

第三部分 仁治理论

第一章 仁的本质规定

- 一、仁作为伦理同情心 118
- 二、仁作为自我完善的潜能 126
- 三、仁作为宇宙本体 134

第二章 仁与社会政治

- 一、“王道”理想 142
- 二、“义”“利”之辨 150
- 三、“权”的思想 158

第三章 为仁之方

- 一、“反求诸己” 168
- 二、“克己复礼” 176
- 三、教育 183

第四部分 法家论

第一章 法家的哲学思想

- 一、“明于天人之分” 196
- 二、经验主义认识论 204
- 三、“察乎性伪之分” 212

第二章 法家的“治”的理论

- 一、“利取”的原则 222
- 二、“法后王”学说 230
- 三、“法治”理论 237
- 四、法家的误区 259

第五部分 墨家论

第一章 墨家的哲学思想

- 一、“三表”的认识论 270
- 二、“非命”的人学 277